

偽滿洲國與反滿抗日運動

林 明 德

- 一、前言
- 二、偽滿洲國的成立
- 三、殖民統治與經濟剝削
- 四、東北的反滿抗日運動
- 五、結論

一、前 言

日本為了侵佔中國東北，攘奪其「生命線瀋蒙」，乘中國自顧不暇，國際情勢最有利的時機，①發動九一八事變，製造偽政權——偽滿洲國。正如「李頓報告書」所指出，偽滿洲國之獨立實係日本政治考慮的產物，其政權並非純粹自發的獨立運動所產生。

日本在滿洲採取日「滿」為一個「經濟體」的政策，實施滿洲的產業開發，經濟統制，壟斷企業。甚至為了籌措財源，實行鴉片專賣，戕害中國人的身心，中國農民受到種種的限制與剝削，勞工亦受到差別待遇。且為了鎮壓中國人的民族反抗、協助其對蘇邊防，進行日韓人大量移民東北的計畫。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必然會引起中國各方的反抗，學生與工商各界普遍掀起救亡運動的浪潮，全國各地紛紛集會遊行，進行抵制日貨運動，東北人民更組織義勇軍，發動大規模的抗日運動。

有關偽滿洲國問題，資料雖極豐富，但少深入之研究。本文擬從日本經略偽滿洲國的政策方針加以探討，並析論中國反滿抗日運動的本質及其意義。

① 參閱拙著，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1984年），頁313-316。

二、偽滿洲國的成立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已在構思採取何種形式，建立何種統治機構，以實行其對我東北之殖民統治的問題。日本參謀本部制定的「一九三一年度形勢判斷」中，曾提出三個階段即三種方式的構想。日本軍部^②採取漸進主義，傾向於實行第一種統治方式，即建立一個名義上歸中國中央政府的親日政權；策畫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則力主實行第三種統治方式，即直接統治中國東北領土，將之劃入日本帝國的版圖。^③事變後，由於代表軍部的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等堅持樹立一脫離中國本土的親日新政權，關東軍遂改變初衷，決定對中國東北實施第二種統治方式，成立獨立國。^④

9月22日，關東軍制定了「滿蒙問題解決策案」，訂立其統治方針為「建立以宣統帝為首，以東北四省及蒙古為領域，受到我國（指日本）支持的新政權，使之成為滿蒙各民族的王道樂土。」規定此一政權的「國防和外交委由日本帝國掌握，交通、通訊的主要部分亦由日本管理，……國防和外交等所需經費，由新政權負擔」，並為了維持地方治安，擬起用熙洽（吉林地區）、張海鵬（黑龍江地區）、湯玉麟或張宗昌（熱河）、于芷山（東邊道）、張景惠（哈爾濱）等為鎮守使。這是日帝製造東北傀儡政權的第一個方案，也是後來建立偽滿洲國的草圖。其後石原莞爾的「滿蒙統治方案」，^⑤松木俠的「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案」、「滿蒙自由國設立案大綱案」，^⑥以及滿洲青年聯盟的「東北自由國建設綱領」（金井章次執筆）^⑦等，無不以「滿蒙問題解決策案」為基礎。這些方案雖有各種各樣的設想，但綜合其基本準則，不外以下三種：（一）將滿蒙從中國本土分離，（二）將滿蒙予以合併，（三）表面為中國人統制，實權則操在日本人手裏。

繼「十月事件」^⑧之後，又有關東軍獨立的流言，處於世界經濟不景氣、政治

② 所謂軍部，指陸海軍省、參謀本部與海軍軍令部等。

③ 石原莞爾，「滿蒙問題私見」，見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國防論策（東京，原書房，1968年），頁76。

④ 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頁187。

⑤ 角田順，前引書，頁85-87。

⑥ 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頁228-229；片倉日誌（1931年10月21日），轉引自緒方貞子，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東京，原書房，1966年），頁208。

⑦ 緒方貞子，前引書，頁208；滿洲青年聯盟史刊行委員會，滿洲青年聯盟史（東京，原書房，1968年），頁656-659。

⑧ 以日本少壯軍人組織的櫻會為中心所策畫的政變計畫（擬暗殺政府要員，佔領警視廳、陸軍省、參謀本部等），但因事機不密而失敗。參閱緒方貞子，前引書，頁158-162。

腐化困境下的日本，將一線希望寄託在關東軍，因此，關東軍的激進行動與製造滿洲新國的構想，不僅容易得到宮府和軍部中央的默認，且普獲民衆的支持。

關東軍於提出「滿蒙問題解決策案」後，即已考慮利用溥儀為傀儡政權首領，採取陰謀手段，挾持溥儀到東北。此一計畫初由天津日本駐軍策畫，旋由關東軍參謀土肥原賢二秘密進行，至同年11月11日，成功的挾往旅順。^⑨

東三省各地在關東軍的策畫、威壓下，著著進行所謂「獨立」、「自治運動」，出現各種自治組織。^⑩同時又在瀋陽設立「自治指導部」，把「自治運動」擴展到縣市。「自治指導部」不僅是日帝攫取縣市等地方政府的主要工具，且為製造偽滿洲國的宣傳機構。此一機構的目的乃在「發展獨立運動」，部長雖由中國人于沖漢充任，職員則絕大多數為日本人。

1931年12月中旬，犬養毅內閣成立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的行動更為積極。翌年（1932）1月初，日軍侵佔錦州後，為了在李頓調查團抵華之前造成既成事實，加速籌建偽滿洲國的步伐。日本陸軍、海軍、外務三省於1月6日制訂「支那問題處理方針綱要」，規定「滿蒙應從中國主權分離，作為一個獨立政權統治的地區，並逐漸形成一個國家。」^⑪關東軍遂依據此一「綱要」，召開一連串的「建國幕僚會議」，商討新國家建設的步驟，決定組織一中央政務委員會（以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主席組織），檢討新國家的名稱、國旗、政治制度、人事、首都等問題。^⑫其間分別與溥儀及各省主席洽商「建國」事宜。至2月17日，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指定張景惠為委員長，熙洽、臧式毅、馬占山、湯玉麟、齊王（哲里木盟的齊默特色木丕勒）、凌升為委員。翌日，發表「獨立宣言」，與國民政府脫離關係。^⑬

其後「建國會議」中，雖一致同意溥儀為「元首」，但對國體意見分歧，帝制派（熙洽、鄭孝胥、羅振玉等）與共和派（張景惠、臧式毅等）互不相讓。關東軍則摒除復辟、共和制的提案，決定推溥儀為國家元首，稱「執政」，新國家國號為「滿洲國」，年號「大同」，首都長春則改稱「新京」。^⑭旋又決定以鄭孝胥為國

⑨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満洲事變（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年），頁174-175。

⑩ 同上書，頁150；緒方貞子，前引書，頁128-130。

⑪ 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變，頁342-344；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卷，資料篇），頁171-172。

⑫ 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變，頁367。

⑬ 易顯石、張總良等，九一八事變史（中和，谷風出版社，1987年），頁239。

⑭ 棚本捨三，全史關東軍（東京，經濟往來社，1978年），頁169。

務總理，臧式毅爲副國務總理，張景惠爲參議府議長，袁金鑑爲副議長，于沖漢、趙欣伯分別爲監察、立法兩院的院長等。^⑯

3月1日，關東軍假借「東北行政委員會」名義，發表了建國宣言，在長春舉行建國儀式。9日，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同時公布「政府組織法」、「人權保障法」。翌日，正式公布偽滿國務總理及各部部長名單。^⑰同一天，溥儀與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交換一項「公文書」，使關東軍支配新國家——偽滿洲國合法化。^⑱此一換文簽署日期雖爲10日，其實在6日溥儀與板垣在湯崗子晤商時，已被迫簽訂，而其細則則早在1月底即由關東軍幕僚迫使溥儀承認。^⑲依據此項換文，「滿洲國」將國防及治安重任委諸日本（所需經費則由偽滿自行負擔），並承認關東軍有管理鐵路、港灣、水路、航空等之權，以及任免重要官吏之大權。^⑳此不啻爲一紙賣身契，充分顯現偽滿的傀儡性。

雖然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都由中國人擔任，但行政中樞的總務廳長官卻由日人駒井德三擔任，握有實權的次長、局長等，多由日人充任，甚至連各級地方政府的次長、廳長、市長等，亦由日人擔任，^㉑足見偽滿洲國的行政大權實由日本人統制、操縱。

同年8月，日本任命武藤信義爲駐偽滿全權大使，兼關東軍司令、關東廳長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9月15日，武藤與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由是奠定其「內面指導」偽滿的法理基礎；同時，日本正式宣布承認偽滿洲國。「日滿議定書」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滿洲國」確認日本在滿洲國所獲得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權益；二是兩國相約共同擔負國防的責任，允許日本派兵駐紮。^㉒

此一議定書在「日滿共同防衛」的藉口下，事實上確認關東軍對偽滿洲國的統治。正如井上清所說：「用條約形式確定了〔滿洲國〕在名義上是獨立國，實質上則完全是日軍佔領下的殖民地。」^㉓關東軍在日本承認偽滿洲國之際，另再指示「

⑯ 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頁395-396。

⑰ 同上書，頁410-427；九一八事變史，頁243。

⑱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東京，日本國際聯合協會，1955年），下，頁216；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頁408-409。

⑲ 滿洲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220。

⑳ 同註⑯。

㉑ 矢內原忠雄，「滿洲問題」，載矢內原忠雄全集（東京，岩波書房，1963年），卷二，頁549-550。

㉒ 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頁497。

㉓ 井上清、鈴木正四，日本近代史（東京，共同出版，1956年），下，頁222。

指導」偽滿的五項基本原則：一、「滿洲國」的政策須由關東軍訂定；二、由日本人施政；三、溥儀為名義上的統治者，日本不承認其權限；四、不允許任何政治團體參政；五、「滿洲國」經濟，藉稅率途徑，力求與日本經濟一致。^②

1934年，日本將「滿洲國」改名為「滿洲帝國」，溥儀由「執政」改稱「皇帝」，年號「康德」。無論是「執政」或「皇帝」，只不過是關東軍的一個傀儡而已。

三、殖民統治與經濟剝削

日本在偽滿洲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是「日滿一體」、國防優先的統制經濟，顯示統制經濟基本方針與計畫綱要的「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1933年4月），其重點在於「與善鄰日本國之間的協調，促進相互間緊密的扶持關係」。日本政府亦擬訂「日滿經濟統制方策要綱」（1934年4月），組織「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以推動「日滿區劃經濟」。「經濟建設綱要」指出，有鑑於無統制之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病，揭露「加諸必要的國家統制，以摒除利益為一部分階級壟斷之弊病，以達萬民共樂」之方針，確定所有重要事業由公營或特殊公司經營之原則。^③

經濟建設的重心是與年俱增的特殊公司與準特殊公司（1941年已增至67家），其在全東北公司總資本額中約占七成，為「日滿一體」國防經濟的基礎。特殊公司集中於兵工、運輸、通訊、動力等大規模的軍需機構，其資本絕大多數是由日本政府與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出資。

「滿鐵」在偽滿洲國初期，主要投資集中在鐵路新線（軍用鐵路）、礦山等軍事性部門，其後因「特殊公司」的大量投入，而轉為專營鐵路。至此，日本的投資遂更集中在具有軍事性的重工業部門（如鍊鋼、煤礦、輕金屬、汽車工業等）。

九一八事變之前，尚在起步階段的東北工業，其主要產業油房業（豆油、豆粕製造），佔全生產額之半，但到了1940年，產業結構驟變，即在工業生產總額之中，金屬機器工業佔31%，化學工業佔15%；在全東北工業之中，日本資本所佔比率已高達84.1%。東北的煤礦生產量佔居日本國內生產量的37%，鐵礦佔330%，可見東北已成為供應日本軍需物資的工廠。^④

② 植田捷雄，東洋外交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下，頁591。

③ 原朗，「1930年代の滿洲經濟統制政策」；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滿洲（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2年），頁1-36；宇佐美誠次郎，「滿洲侵略」，岩波講座，日本歷史（東京，岩波書店，1963年），現代③，頁223-224；小林英夫，大東亞共榮圈の形成と崩壊（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5年），頁48。

④ 小林英夫，「日本の『滿洲』支配と抗日運動」，野澤豐、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卷六，頁226。

九一八事變後，「滿鐵」竭力協助日軍的軍事行動，不僅軍事運輸方面，在情報活動、文宣活動方面亦盡力不少。^㉙ 1933年，偽滿洲國宣布鐵路國有化政策，所有鐵路均委由「滿鐵」經營，於是另設一鐵路總局管理鐵路、港灣與航路。1934年秋，經過多次談判，終於收購中東鐵路，^㉚ 東北的鐵路機構遂得一元化經營。

「滿鐵」是日本在東北的「東印度公司」，規模龐大（1937年時，資金8億圓，員工近12萬人，此外尚有衆多的臨時華工；1944年時員工總數已高達40萬人），為日本最大的「國策企業」，也是對華經濟侵略的前鋒、殖民地經略的根據地。

偽滿洲國不僅採取統制經濟政策，對各種農業生產亦嚴加統制。1932年10月，規定鴉片專賣，實行播種與販賣的管制。在很多農產品收穫量減少聲中，唯獨鴉片一枝獨秀。鴉片的地租為普通農產品地租的一半甚至全免。鴉片的稅收成為偽滿洲國政府的一筆大財源（居專賣品總收入之半）。日本為了取得經略滿洲的經費，並削弱中國人民的抵抗力，允許鴉片與麻藥的買賣。同時為了取得日本紡織業的原料，強制性的鼓勵種植棉花。

日軍有鑑於列車屢被襲擊，於1933年4月，頒布「喬禾植物種植禁令」，禁止鐵路兩旁五百公尺以內、軍用汽車道路兩側二百公尺以內，種植主食高粱、玉蜀黍等高莖穀物，使農民蒙受很大的損失。^㉛ 又為了加強治安，杜絕「匪徒」，強制推行「集團村落」制，結果卻迫使農家住居與耕地間距離拉遠，降低生產力。^㉜

在日本佔領下，農業恐慌日益嚴重，農產品價格暴跌。^㉝ 不僅農產品產量銳減，耕地面積亦減少，甚至連土地價格、農村工資亦隨之跌落，賦稅卻反而增加，農民負擔極為沈重。^㉞ 其後隨着侵華戰爭之擴大，盛行強制徭役，影響農耕甚巨。

日本對中國勞工之剝削不亞於對農村之壓榨。壟斷東北產業的日本資本家實行民族的差別待遇，華工工資僅及日本低廉工資的三分之一，工人宿舍管理有如牢房。^㉘ 勞工的意外災害亦與日俱增（1936年較1931年增加5倍多），其後更因頒發

^㉙ 宇佐美誠次郎，「滿洲侵略」，頁230-231；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洲事變と滿鐵（東京，原書房，1979年），卷上，頁399-406。

^㉚ 日（偽滿）以一億四千萬圓（另加退職金三千萬圓）收購。見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滿鐵史資料（北京，中華書房，1979年），卷二「路權篇」，第四分冊，頁1306-1318。

^㉛ 小林英夫，前引文，頁237。

^㉜ 宇佐美誠次郎，前引文，頁235。此一制度之目的在促使「匪民分離」。

^㉝ 同上，頁236-237。

^㉗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北京，三聯書房，1957年），輯三，頁542-549, 557-564, 577-581。

^㉘ 安藤彥太郎編，滿鐵——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5年），頁118-119。根據1939年8月的調查，日本人經營的工廠、礦山，華工工資平均僅及日本勞工的29%。

「勤勞奉仕法」，直接徵調勞工，推行強制性勞動，勞工災害益繁。至於物價、生活費指數，均倍於日本國內。^⑬這是倡導「王道樂土」、「國民協和」的偽滿洲國的社會經濟實況。

但引起中國人反感，構成最大威脅的是日本的農業移民問題。其實，移民問題起源甚早，並非九一八事變後才開始。自日俄戰爭以後，日本的大陸政策驟轉積極，侵略東北的步驟加劇，移民東北已成為日本對滿擴張政策的主要目標。日俄戰爭後，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擬訂一項20年內移民東北400萬人的計畫，續有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提出「文裝的武備」方式，於10年內移民東北50萬人的主張。^⑭後藤在其「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文中，明確的舉出日本經略滿洲的三大方針：鐵路經營、煤礦開發與農業移民。^⑮日本對前兩者積極推動，效果極為彰顯，移民則無甚進展。但日本始終不懈，仍千方百計推行擴大其移民東北的計畫。日俄戰爭後，日本雖取得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等地，對擴展其在東北勢力的野心未嘗稍戢，移民更為其經略滿洲之一環。但移民的先決條件，必先取得土地的使用權，於是又有1915年二十一條第二號之提出，因而衍生土地商租權問題。根據同年5月25日所簽訂「中日南滿洲東部內蒙古條約」中第二條規定，日本國臣民在南滿，為建造工商業應用之廠房，或為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之地畝。又關於南滿商租解釋之換文則謂「條約內所載商租二字，須了解含有不過三十年之長期及無條件而得續租之意。」此外，日本又在第三、第四條取得雜居權，以及與東蒙合辦農業之權，此三者同為日本農業移民的條約依據。商租權之實行，引起中日間無窮的糾紛。^⑯中國方面，無論是中央政府或東北地方政府，無不設法加以抵制。在簽訂「民四約章」（二十一條）時，即已聲明係受日本壓迫，不得已忍受最後通牒中各項條件。其後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先後提出取消要求。1923年1月，復經參衆議院議決，宣告無效。^⑰但日本一直強調此一條約在國際法上之合法性，始終不讓步。在東北的日本人以為「商租權的確立乃是我（日本）發展滿蒙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力圖在商租權名義下，攫奪土地所有權。中國政府則指商租權之設定乃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領土的手段而力加抗拒，「民四約章」簽訂後不久，袁世凱政府即頒布「懲

⑬ 宇佐美誠次郎，「滿洲侵略」，頁238。

⑭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東京，後藤新平傳記編纂會，1937年），卷二，頁659。

⑮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殖新報社，1911年），頁40。

⑯ 參閱淺田喬二，前引書，頁315-369。

⑰ 東亞時局研究會編，大滿洲國（1933年），卷上，頁416，引自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滿洲，頁332。

辦國賊條例」，加以遏制；^⑧ 繼又公布「商租地畝須知」作為商租契約的基準，其中嚴格限制商租權的範圍，以防堵日本的土地侵佔。^⑨ 至1929年，又頒布「土地盜賣嚴禁條例」，重申嚴格限制商租權之前令。^⑩ 東北地方政府亦自1920年至九一八事變前，先後制訂各種禁令、罰則，遏止隨意租售土地給外國人。^⑪ 以上是中國官方訴諸法律手段以阻止商租權的措施，茲再舉中國官民實力阻止日人商租之例，藉以瞭解商租權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東北擁有最多土地的是東亞勸業株式會社，該社是日本帝國主義為統制滿洲，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目的，而由滿鐵、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大倉組等共同出資所設立的半官方公司。^⑫ 自1922年初設立後，即假借「南滿東蒙條約」取得大量土地（1932年3月已有1,300餘畝土地），因而被視為日本侵佔滿洲土地的尖兵，其土地經營當然成為中國官民強烈攻擊的對象。其中哈番農場、東山農場、通遼農場，均受到中國官民的實力阻撓。^⑬ 此外，在奉天附屬地附近的榎原農場，亦因土地商租權問題而發生衝突，奉天省政當局甚至鋪設一條貫穿農場的鐵路，破壞農場水溝，以阻其耕作，展開反對商租權的實力運動。結果，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土地商租權，因受中國的有力阻止而未能順利的推展，日本的農業移民亦因而受到挫折。日本農業移民東北之所以終歸失敗，一方面固然歸因於土地商租權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一方面則為經濟的原因，即日本農民生活費較高，農業經營之條件不如中國農民。^⑭

然而偽滿洲國成立之後，情勢為之一變，蓋在政治上、社會上，阻止日本假借商租權攫奪土地的條件已被排除，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控制偽滿洲國的情況下，土地商租權已成具文，日本的農業移民遂得以毫無阻力的積極推展。自此，日本各方的「滿洲開拓民計畫」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不僅關東軍、滿鐵先後擬訂大規模的移民滿洲計畫，^⑮ 民間亦有積極倡導者，於是促成日本拓務省「六千人移民案」的實施，^⑯ 自1932年8月起試辦四年。1936年，因二·二六事件

⑧ 叔綱，「民四條約之商租權問題」，革命文獻，輯31，頁218。

⑨ 滿鐵庶務部調查課，支那側の商租妨害手段（1929年），頁8。

⑩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東京，未來社，1973年），頁348。

⑪ 同上，頁342-343, 348。

⑫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と舊殖民地地主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8年），頁222-223。

⑬ 同註⑩，頁356-360。

⑭ 山田豪一，「滿洲における反滿抗日運動と農業移民」，歷史評論，142號（1962年6月），頁56-64。

⑮ 滿洲移民史研究會編，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滿洲移民（東京，龍溪書舍，1976年），頁6-12。

⑯ 同上，頁24-28。

⑦而成立的廣田弘毅內閣，擬訂一項20年移民100萬戶500萬人計畫，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國策之一而大力推動。⑧

日本之移民中國東北，不僅是爲了增加其在殖民地的本國人口，推行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同時也是日本農漁村經濟更生政策之一環，藉以緩和1930年代所受農業恐慌的困境。爲了解決日本農村的過剩人口，大量遣送農家次男以下未成年男子赴滿，推行所謂滿洲開拓青少年義勇軍制度。1937年以後，由於中日間的全面戰爭，日本進入戰時經濟時代，農村過剩人口爲徵兵及軍需工業所吸收，成人移民愈感困難，青少年移民愈盛。至此，原初的農業移民，隨着時局的遽變，轉爲武裝移民，而有移民實邊之意義。

根據1939年日本政府擬訂的「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等，日本移民東北的主要目的有四：(一)紓解日本農村的過剩人口，(二)改良東北農業，促進日「滿」一體化，(三)維護滿洲的治安，(四)加強對蘇聯的國防。⑨ 關東軍尤其着重最後兩點。倡導移民東北最力的關東軍司令部武官（兼偽吉林軍顧問）東宮鐵男所提移民方案，即在吉林省依蘭縣安置後備軍人組成的屯墾軍，以協助日本維持治安、增強對蘇戰備。此後日本大都採取東宮的武裝移民方式，即將移民團配置在中國反滿抗日勢力較大的地區，⑩ 或在東北北部、東部等邊境地區，在在顯示其武裝屯墾的軍事意義。

日本這種肆無忌憚的集體武裝移民，不僅掠奪東北的土地，且對中國農民構成生存上的威脅，因此糾紛時起。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農業移民前鋒的韓國移民（在延吉地區即達六十餘萬人）與中國農民之間已發生過「萬寶山事件」，⑪ 到1934年，更由於日本集體移民團的巧取豪奪，掀起了「土龍山事件」。

土龍山事件可說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壓制、經濟剝削、殖民地式攘奪而掀起的農民運動。這是1934年3月，由三江省依蘭縣土龍山地區保董謝文東、土龍山農務會長井止揮所指導，反對日軍收購土地、收繳武器、⑫ 種痘等的農民（一萬餘人）武裝起義。三江省地區爲日本人農業移民團移植地，由於強制徵收大量土地，又在治安維持會指導下，強行實施保甲制度，引起民衆的激憤，及至實施「種痘」

⑦ 二·二六事件是1932年2月26日，日本陸軍少壯軍官率領東京第一師團四百名官兵叛亂的事件。雖襲擊首相、藏相官邸及警視廳等，但僅三日即被敉平。

⑧ 同註⑦，頁44-45；宇佐美誠次郎，「滿洲侵略」，頁231-232。

⑨ 山田豪一，前引文，頁62-65。

⑩ 藤原彰、野澤豐，日本ファシズムと東アジア（東京，青木書店，1977年），頁146-147。

⑪ 萬寶山事件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日本故意製造的反華事件。此即日本利用萬寶山中韓農民的工地爭執，從中挑動，引發朝鮮各地的排華。

⑫ 山田豪一，前引文，歷史評論，143號（1962年7月），頁74；小林龍夫，前引文，頁241。

時，民衆遂指其爲圖謀「藥殺」（用藥殺人）而羣起反抗。農民蜂起後，攻擊土龍山警察局，包圍依蘭縣城，並襲擊日本第一次武裝移民團（永豐鎮移民團）、第二次移民團（自七虎力逃往湖南營）。同年5月，關東軍出動大批軍力，突破包圍網，並以飛機、戰車反擊，農民傷亡殆半，但給與日本移民團相當大的打擊。

謝文東指揮的農民游擊隊雖屢遭關東軍之追擊，卻在依蘭、通化、勃利諸縣建立強大的反滿抗日的根據地，後來與其他抗日武裝部隊合流，成爲東北反日聯軍第六軍的基幹。^{⑤3}

佳木斯、依蘭地區是日本攘奪農業移民用地最烈，也是日本農業移民密集地區。日本農業移民的目的在於維持滿洲的治安，撲滅抗日武裝遊擊區，補充關東軍的後備兵力，但其結果卻引起偽滿洲國治安的惡化。^{⑤4} 日本統治者亦承認其武裝移民，導致經濟壟斷與剝削，「產生民族的對立，抗日運動之熾烈化。」^{⑤5}

四、東北的反滿抗日運動

在日軍節節進逼，擴大侵略範圍，而南京的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之下，全國掀起了以學生、工商界爲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侵略的民族抗日運動。

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長沙、廣州、福建等地的大中學生，紛紛舉行罷課遊行，發表通電，進行抗日宣傳。^{⑤6} 東北留平學生和東北流亡學生聯合召開抗日救國大會，成立抗日組織，發表抗日通電。^{⑤7}

9月下旬，各地學生紛紛向各地方政府請願，並派代表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抗日。^{⑤8} 逃亡到北平的東北各民間團體負責人及各界愛國人士，聚集於奉天會館，成立「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分派東北各地負責組織和聯絡東北抗日義勇軍，積極推展抗日運動。^{⑤9}

工人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抗日運動中亦頗積極。9月下旬，上海碼頭工人三萬多人爆發了反日大罷工，拒絕爲日本船隻裝卸貨物。23家日商紗廠工人起而響應，發起同盟罷工。上海郵務、水電、針織、造船等一百多個工會的數萬工人和上海市民

^{⑤3} 滿洲國軍政部顧問部，滿洲共產匪の研究（東京，大安，1973年），輯一，頁723。

^{⑤4} 喜多一雄，滿洲開拓論（1944年），頁149。

^{⑤5} 滿洲共產匪の研究，輯二，頁723。

^{⑤6} 潘喜廷、卞直甫等，東北抗日義勇軍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22-423；九一八事變史，頁267-269。

^{⑤7}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頁52-53, 56-7。

^{⑤8} 九一八事變史，頁268。

^{⑤9}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頁58。

發起抗日救國大會，並舉行抗日示威遊行。除上海外，北平、天津、廣州、香港等大城市的工人，也都掀起了抗日浪潮，甚至連偏遠城市的職工，也都以發表宣言、募捐、請願等方式，展開抗日運動。

此外，宗教團體、婦女界、文化界，都有抗日救國的宣示和舉動。[◎] 華僑對義勇軍的支援與捐助更不遺餘力。[◎]

1932年1月，淞滬戰爭開始，上海市民衆和全國人民，或組義勇軍、救護隊、前線服務團，直接參戰，並為前線將士服務；或捐獻財物，展開抗日宣傳、支援抗戰。淞滬停戰以後，蓬勃興起的抗日高潮暫趨低落，直到1933年年初，日軍進攻熱河時，全國民衆的抗日救亡運動乃又如火如荼的進行。

在抗日的潮流影響及工人、學生等的激勵下，全國各城市的工商界也展開了抵制日貨運動。其實，這次抵制日貨運動，始於1931年7月的萬寶山事件，至九一八事變後而擴大。

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國大會通電全國，提出「對日實行不合作主義」、「不在日廠作工、不買日貨、不用日鈔」等口號。於是天津、漢口、上海等城市的工商業者組織，相繼實行對日經濟絕交，查禁日貨、拒絕與日商買辦往來。各地亦先後成立了抵制日貨的機構，尤以上海最為徹底。上海於9月22日召開各團體代表大會，改「反日援濟會」為「抗日救國會」，設置「對日經濟絕交實施委員會」等，積極地推動抵制日貨運動。[◎] 根據申報（1932年8月2日）的統計，1931年後半年日本對華貿易銳減，日本全國航運業也受到嚴重的影響，在華廠商的營業則一蹶不振。[◎] 然因中國金融界亦受到波及，政府當局又盡力設法將抵制日貨運動限定於合法的範圍內，以致此一運動漸趨低潮。[◎] 及至淞滬戰爭爆發，抵制日貨運動進入另一高潮。上海事件原是日軍為轉移國際視線，確保其侵略東北的果實而發動，而其派兵藉口則歸諸抗日救國會的排日、抵制日貨運動。[◎] 此一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則隨着日軍之登陸上海而起，結果迫使日本在華中的工商業基礎受到嚴重的打擊。蓋此次抵制日貨運動，以長江流域為最烈，珠江流域次之；至於東北，則以日本勢力增漲，無法實行抵制日貨運動，但因受到軍事影響，日貨亦受到相當的打

[◎] 同上，頁442。

[◎] 同上，頁445。

[◎] 菊池貴晴，中國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東京，大安，1966年），頁380。

[◎] 同上，頁415-421；李雲漢編，九一八事變史料（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頁375。

[◎] 同上，頁390。

[◎] 同上。

擊。⁶⁶

這次的抵制日貨運動與過去幾次排貨運動情形大為不同，蓋國人民族的覺醒程度已遠非昔比，尤其日本露骨的軍事侵略，更加刺激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抵制運動之意志益加堅定，因此，普遍的展開經濟絕交運動。而最大的特徵則是民衆運動之抬頭，而粗具國民總動員的規模。⁶⁷

日本對於中國抵制日貨運動，採取以武力威嚇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使其制止，或買通中國奸商反對，⁶⁸甚至運用外交手段，在國際聯盟提出反對中國抵制日貨運動，以謀補救。⁶⁹李頓調查團對中國之抵制日貨運動，頗有指摘之詞，中國參與國聯調查委員會之代表顧維鈞，則由國際法、國際慣例及國內法加以反駁，認為中國之抵制日貨，為對待破壞關於中國之國際成約的一種報復行動，且為國際慣例、法律學說及國聯所承認許可的合法行動，不涉及中國政府的責任。⁷⁰

在全國各界展開反日示威遊行、請願以及抵制日貨運動的同時，東北地區的軍民亦掀起各種形式的抗日運動。參加抗日活動的，有軍（舊東北軍）警、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商人、富紳以及「綠林好漢」。⁷¹其中最為活躍，給日軍以重大打擊的是東北義勇軍。所謂東北義勇軍是東北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總稱，不僅指原東北軍，且包含一般農民、工人所組成的反日義勇軍、各種民間團體（如大刀會、紅槍會等）組成的游擊隊，以及共產黨的赤色游擊隊。⁷²

東北義勇軍的名稱繁多，如「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東北抗日救國軍」、「吉林國民救國軍」、「黑龍江救國軍」、「抗日大刀會」等。其組織雖多，目的卻是一致的，即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驅逐日寇出東北，收復失地。東北的武裝抗日運動可分前後二期，前期自九一八事變到1933年，這是舊東北軍抗日運動鼎盛時期，此後因日偽軍之「討伐」，其勢漸衰；共黨的赤色游擊隊卻逐漸得勢，組成抗日聯軍而掌握後期的抗日運動。⁷³此由下表即可窺出梗概。

東北義勇軍的主力是舊東北軍。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東北軍即對日本帝國主

⁶⁶ 九一八事變史料，頁386。

⁶⁷ 東方雜誌，卷23號28，「對於日寇東北之輿論一般」。

⁶⁸ 九一八事變史料，頁389-390。

⁶⁹ 國民政府外交部編，中日問題之真相——參與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提出之二十九種說帖，1932年4月至8月（臺北，學生書房，1975年），頁264。

⁷⁰ 同上，頁256-265。

⁷¹ 東北抗日義勇軍，頁64-65。

⁷² 小林英夫，前引文，頁225；滿洲——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頁240。

⁷³ 小林英夫，前引文，頁243。

| 抗日軍種類 時 間 | 反日義勇軍 | 游 擊 隊 | 土 匪 | 合 計 |
|--------------|---------|-------|--------|---------|
| 1931年9月以前 | — | — | 46,000 | 46,000 |
| 1931年9月以後 | 170,000 | 500 | 49,500 | 220,000 |
| 1932年 | 100,000 | 850 | 69,150 | 170,000 |
| 1933年 | 25,000 | 2,220 | 36,080 | 63,300 |
| 1934年 | 12,000 | 3,200 | 20,800 | 36,000 |
| 1935年 | 7,900 | 9,200 | 13,650 | 30,750 |
| 1936年 | 5,800 | 6,800 | 13,550 | 26,150 |
| 1937年 | 2,000 | 6,500 | 6,400 | 14,900 |
| 1938年 | — | 4,400 | 1,350 | 5,750 |
| 1939年 | — | 2,400 | 640 | 3,040 |
| 1940年 | — | 1,480 | 450 | 1,930 |

資料來源：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滿洲共產主義運動概史，頁127。

附 註：日軍指舊東北軍及其所組成之反日義勇軍為「政治匪」，共黨赤色游擊隊則稱「共匪」，「土匪」則指農民或綠林所組游擊隊（大刀會、紅槍會等）。

義的蠶食侵略極為憤慨，曾多次與之發生衝突。事變爆發後，雖奉中央政府不抵抗之命，未作有組織的抵抗而撤退，^⑭但部分官兵卻自動的抵抗，在北大營突圍戰、錦州退軍之戰，均有英勇的表現。^⑮其後一部分領導者號召其屬下士兵，以及具有反滿抗日意識的民衆，在各地揭竿而起，成為東北義勇軍抗日勢力的核心。^⑯其組成分子相當複雜，又乏統一領導，但力量雄厚（最盛時達十數萬之衆），其活動地區亦遍及東北各地。茲就省別加以分述。

遼寧省：東北抗日義勇軍最早興起於遼西，主要是由退入錦州的原遼寧省警務處長黃顯聲所組織，以各縣民團和公安隊員為骨幹的義勇軍。開始時稱「遼寧抗日義勇軍」，規模不大，人數不多，直到馬占山嫩江橋抗戰爆發後，始得迅速發展，約計六萬餘人，1932年4月，改稱「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當日偽軍相慶偽滿洲國成立時（1932年3月9日），義勇軍曾一度攻入瀋陽城。最令日軍膽寒的是鄧鐵

^⑭ 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臺北，傳記文學社，1972年），頁92-93。

^⑮ 九一八事變史，頁308-309。

^⑯ 東北民衆救國軍委員會編，九一八與東北民衆救國軍（1932年），頁27-34。

梅、苗可秀部。他們活躍於安奉線，有時破壞鐵路，有時進攻鳳凰城。^⑦此外，唐聚五所率領的「遼寧民衆自衛軍」、李純華指揮的「東北民衆抗日救國軍」，均有數萬兵力，屢與日偽軍展開激烈的戰鬪。^⑧

遼寧境內的抗日義勇軍，與北平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關係密切，不僅及時得到武器彈藥和物資的接濟，而且也得到切實的領導。^⑨1932年5月，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與「遼吉黑民衆後援會」合作，根據當時遼寧、熱河邊境抗日義勇軍的發展和抗日的需要，將東北民衆抗日義勇軍的編制，改按地域劃分為五個軍區，統轄管區內所有抗日義勇軍、民團及其他抗日武裝團體，同時改東北民衆自衛義勇軍為東北民衆抗日救國軍。此軍經常在遼熱邊區出擊，使日偽軍疲於奔命。^⑩

吉林省：吉林地區組織抗日義勇軍較遼寧省為晚，但頗為集中，其骨幹是舊東北軍的官兵和農民。主要的抗日義勇軍有「吉林自衛軍」、「吉林國民救國軍」、「吉西抗日軍」等。由於熙洽在日本關東軍卵翼下，於1931年9月底成立吉林臨時政府，依蘭鎮守使李杜、前中東鐵路護路軍司令丁超等起而反抗，在哈爾濱組織吉林自衛軍，攻擊偽吉林省于琛激軍，但未成功。^⑪李、丁軍退往依蘭之後，改由馮占海等指揮，並於翌年六月改名為「吉林省抗日義勇軍」，兵力日益擴增，給與日偽軍很大的打擊。^⑫吉林國民救國軍的領導人是舊東北軍營長王德林。王氏於1931年11月起義，翌年2月，連絡當地抗日組織大刀會與朝鮮革命總同盟團等，在敦化成立「吉林國民救國軍」總司令部。此部義勇軍約有四萬人，主要活動於東邊道一帶。^⑬「吉西抗日軍」則是1931年10月於洮南成立的。成立時僅有六百餘人，其後發展很快，未幾即達數萬之衆，^⑭主要活動於吉林西部。

黑龍江：日軍佔領瀋陽後，在吉林、黑龍江等省採取籠絡手段，企圖利用熙洽、張海鵬等，在吉黑樹立新政權。馬占山則先聲奪人，進入黑龍江省與之對抗。馬軍於1931年11月4日，在黑省南部中東鐵路嫩江橋畔還擊進犯的關東軍，雖屢次使日軍的攻勢受阻，但由於雙方兵力懸殊，經兩週的浴血奮戰，遂放棄全線陣地，退到海倫。嫩江橋保衛戰不僅得到黑龍江省「援馬抗日團」等的支援，且獲得全國

⑦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頁67。

⑧ 同上；九一八事變史，頁322。

⑨ 九一八事變史，頁329。

⑩ 同上，頁322-323；同註⑦；太平洋戦争への道(2)，頁186-187。

⑪ 九一八事變史，頁316。

⑫ 同上，頁325。

⑬ 同上，頁326；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頁69。

⑭ 九一八事變史，頁326。

廣泛的聲援與讚揚。◎此時國聯調查團正在東北調查，這次表現出東北人民英勇抗日的戰役，立即成為世界注意的焦點。其後馬軍屢遭日軍的圍攻，受到重創，終於退往蘇聯境內。◎馬占山領導嫩江橋抗戰，雖未使東北的局勢好轉，但「其豐功偉績，在中國歷史上，亦終有不能磨滅湮沒者。」◎

黑龍江省抗日義勇軍的主力是馬占山、蘇炳文所部的東北軍。此外，尚有相當數量的義勇軍轉戰於吉黑二省之間，其中主要的有「東北民衆救國軍」、「黑龍江救國軍」，以及民衆組織的「大刀會」、「紅槍會」等。

總之，東北抗日義勇軍雖有高昂的鬥志，採取各種出奇制勝、化整爲零的游擊戰術，但由於沒有一個堅強的抗日領導核心，缺乏統一的組織，因此面對武器、訓練等方面優越的日偽軍，最後仍歸於失敗。然而東北義勇軍在一時期內（九一八事變後至1933年之間），給予日偽軍以沉重打擊。後來的抗日聯軍在廣大領域的展開反滿抗日運動，不僅削弱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的基礎，且迫使關東軍的對蘇戰爭準備發生困難。◎

日本帝國主義爲「鎮壓」東北的反滿抗日運動，試圖直接統制奉天軍閥時代的屯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集團部落政策」等，但未成功。◎

五、結論

1931年9月，日本乘中國的內部混亂，◎及國際情勢有利時機，◎發動柳條溝事變，翌年1月初進佔錦州，在一百天內即席捲了整個東北。至此，日本的大陸攻擊，由「文裝的武備」轉變爲「軍裝的武攻」，對東北進行全面性的侵略。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擴展其勢力，攫奪我東北的產業與資源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其後又爲了因應蘇聯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1928年起）以後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以及中國民族運動的浪潮，遂以民族自決與所謂「五族協和」爲標榜，製造偽滿洲國。策畫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經由「本庄、溥儀換文」，以及「日滿議定書」，確立由關東軍統制、掌握偽滿洲國大權的特殊政治型態。

◎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頁373；九一八事變史，頁305。

◎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頁74。

◎ 國際協報，1931年11月22日，引自九一八事變史，頁313-314。

◎ 小林英夫，前引文，頁249-250。

◎ 同上，頁238；滿鐵——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頁250。

◎ 中國內部，在1929至30年兩年間不斷的發生內戰，1930年的中原大戰，使國家的元氣大傷。翌年，南京與廣州兩政府形成對立，同年又有長江大水災，天災人禍紛至沓來。

◎ 横著，近代中日關係史，頁313-316。

另一方面，九一八的炮聲激起了全國民族抗日運動的怒潮，各地民衆紛紛起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大中學生發動集會遊行，進行抗日宣傳，建立抗日團體，組織抗日義勇軍。工人亦爆發了反日大罷工，成立各種義勇隊、宣傳隊，進行抗日活動。在學生、工人等的倡導下，全國掀起了抵制日貨運動，給予日本帝國主義相當嚴重的打擊。而東北義勇軍的英勇抗日，不僅振奮了全國人心，且對偽滿洲國及關東軍構成很大的威脅。

東北義勇軍是在近代東北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社會基礎上產生、發展的，也是在異族入侵、國破家亡的情況下，東北廣大民衆自發組織的抗日運動。東北義勇軍的成員極為廣泛，不僅包括舊東北軍、士紳、地主與農民，甚至綠林、鬪匪等亦多參加。初期的武裝抗日則以舊東北軍為主，直至1933年初始在日偽軍的「征剿」下驟衰。其後與中共有關的「東北抗日聯軍」成立，從事游擊戰的「共產匪」逐成為日偽軍「征剿」的對象。

偽滿洲國的長遠目標乃是建立一個堅強的「國防國家」，一方面發展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一方面實行經濟統制，以確立隸屬日本的「日滿經濟圈」（日滿經濟體制）。

在國防國家的建設目標下，日本積極推動移民東北的計畫。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的農業移民完全失敗，事變後，由於過去移民的障礙已消除，於是積極而有組織的推動。自1932年10月，拓務省派遣第一批集體移民以後，「鐵路自警村」、「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等具有軍事、治安作用的各種農業移民，相繼派往中蘇邊境及中國抗日游擊隊地區。1936年的「開拓民計畫」規模頗大。廣田內閣所擬訂的大規模移民計畫，雖受二次大戰影響而未能順利推行，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集體移民多達933團，20萬人之衆，其對中國農民之壓搾、農地之攘奪甚烈。中國農民面臨日韓移民的壓迫與威脅，屢次起而反抗，九一八前夕的「萬寶山事件」，以及1934年的「土龍山事件」，均種因於移民問題。

總之，日本為了促成「日滿經濟體制」，壟斷東北的經濟資源，充實其國防軍備，確保日本帝國的地位，不僅要求日「滿」的協力合作，且企求「日滿中三國之密切合作」，因此，只有東北資源的開發已不能滿足日本的需要；而東北義勇軍的抗日運動，更削弱偽滿洲國的基礎，影響關東軍的對蘇戰備，這也就是何以繼九一八之後，日軍繼向熱河進攻，並進圖華北，終於發動七七侵華戰爭的主要原因。